

从不同的哲学观看中国哲学史的研究

俞秀玲

【内容提要】 确立不同的哲学观对于哲学史的研究是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的。今天的中国哲学和整个中国文化,正面临着中国社会转型的挑战以及新世纪的选择、重构和再建。在这种情况下,胡适、冯友兰的哲学观,正可以作为理解中国哲学史的基础,其不同的哲学观而形成了不同的哲学史,这对我们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哲学面向现代化、面向新世纪的新开展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关键词】 哲学观 哲学史 冯友兰 胡适 新开展

任何一部好的哲学史,都是由一定的明确的哲学观决定的,哲学观又决定了哲学史的选材和分析论证,也就是说,依据什么来选材,依据什么来分析论证,这说到底还是由哲学观来决定的。胡适和冯友兰就是这样两位哲学史研究者,其选材和方法开天辟地,但说到底,还是一个哲学观问题。可以说,不同的哲学观的确立对于哲学史的研究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明显的影响的。而今日之中国哲学和整个中国文化一起,正面临着中国社会转型的挑战以及新世纪的选择、重构和再建,在这样的境况下,我们有必要重温胡适、冯友兰的哲学观,这不仅仅是理解中国哲学史的基础,它也有助于我们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哲学面向现代化、面向新世纪的新开展。

—

作为中国哲学史的开路人,胡适在其《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曾试图给出一个哲学的定义,他说:“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1] 什么叫“人生切要的问题?”又怎样才算从根本上想,从根本上解决?胡适这个定义的边界并不是很清楚,实际上,正由于在这样模糊不定的哲学观的影响下,胡适对哲学所列的门类也就未免有些芜杂。他举出六类,即:宇宙类、名学及知识类、人生哲学(伦理学)、教育哲学、政治哲学、宗教哲学。在此,胡适关于哲学的定义和分类在逻辑上混乱,分类标准不一,因为这种分类不是一个层次上的,前三者属于较纯粹的哲学范围,也就是现在仍然沿用的哲学三分法,而后三者则属于比较扩大的哲学范围,在此,胡适的定义不是很成功,当然,这也因为定义本来不易做,但这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胡适的方法论思路。本来,他是在西方实用主义哲学方法的引导下来对中国

哲学史进行研究的,但是在论证方式上,胡适没有完全采用这一方法,也没有吸收西方的数理逻辑,即,逻辑分析方法,而仍以乾嘉学派所采用的历史归纳法来研究中国哲学史。他对儒、墨、释、道等思想派别的源流、对《水经注》、《红楼梦》等古籍的版片、年代、真伪等详加考证,从而使国故整理变成了对国故的考证,由此可见,胡适治学对我国传统精神的深入承袭,一如梁启超所言:“绩溪诸胡之后有胡适者,亦用清儒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2]而从另一方面,从论证目的看,胡适对国故的考证又是为评判国故价值服务的。本来考证是手段,评判才是目的,但受乾嘉汉学的影响,使国故考证成为其一生之务求。胡适不仅在这一方法论的指导下使国故整理陷入国故考证,而且在文化整合的努力中,由于他对方法论的过度重视,又使他把一切学术思想以至整个文化都化约为方法,“重视的永远是一家或一派学术思想背后的方法、态度和精神,而不是实际内容。”^[3]由此,使他的中西文化融合只限于治学方法领域,而远没有达到实质内容的精神层次,这种理论缺陷又进一步影响了他的社会实践。更为重要的是,胡适并没有运用实用主义的哲学方法论来构造一个哲学思想体系,没有运用思辨的和概括的分析。也正是在这样的境况下,胡适理想中的中国哲学史的做法,尽管包括“明变、求因、评判等步骤(还应包括述学)”^[4],但胡适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给人的感觉,是其长处在于史学而不是在哲学方面。

而对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冯友兰是持有不同的哲学观的。在哲学的对象和特质方面,冯友兰最初在其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中认为:“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5]可见,在冯友兰的心目中,什么是哲学,标准应该是西方“哲学”这一概念固有的含义。冯又说,“可见西洋所谓哲学,与中国魏晋人所谓玄学,宋明人所谓道学,及清人所谓义理之学,其所研究之对象,颇可谓约略相当。”^[6]在此,可以看出,这样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主要是从西方哲学的概念出发的。为免去胡适所遇到的困境,冯友兰的做法是,“兹先述普遍所认为哲学之内容。知其内容,即可知哲学之为何物,而哲学一名词之正式的定义,亦无须另举亦。”^[7]冯友兰所述的哲学内容即如西方对哲学的定义,包括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也就是上述胡适所举的哲学的前三类。也就是说,关于哲学内容的阐述,胡适与冯友兰意见并无不同。这种三分法的模式且一直沿用至今。在死扣“哲学”这一西学术语本意的基础上,冯友兰此时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从选材到评价方面都是依据这样一种“哲学”的标准和尺度进行的。

在后来的《中国哲学简史》中,冯友兰说:“哲学在中国文化中所占的地位,历来可以与宗教在其它文化中的地位相比。”^[8]这种开篇方式与早期著作已显然不同。它明显给人一种感觉,中国不仅有哲学而且哲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十分重要,从这样的论述,至少不会感到哲学对于中国文化是外来的东西。对于哲学的定义,冯友兰说:“哲学,宗教都是多义的名词。对于不同的人,哲学、宗教可能有完全不同的含义。人们谈到哲学或宗教时,心中所想的与之相关的观念,可能不大相同。至于我,我所说的哲学,就是对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9]也许这是在给外国人讲中国哲学,因此与早期给中国人讲哲学的著作不同;也许因为这是一部“小史”,而不是像早期那样的巨著,所以冯友兰不再详细谈论哲学这一概念的来源,而是直接讲什么是哲学,当然,这也是

他自己所理解的哲学。从字面上可以看出，同样是中国哲学史，冯友兰对哲学的论述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

二

在上面我们已经提到，胡适以偏重于史学的方法来讲述中国哲学史，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看冯友兰是偏重于哪一方面的？冯友兰明确提出：“有历史家的哲学史，有哲学家的哲学史。历史家的哲学史是注重‘谁是谁’，哲学家的哲学史是注重‘什么是’。”^[10]冯友兰为自己申辩，将《中国哲学史》定位于哲学家的哲学史，他说，“吾非历史家，此哲学史对于‘哲学’方面较为注重。”^[11]正因为此，他对来自历史学方面的批评也就不以为然。他的批评者（张荫麟）认为冯著的特长在哲学方面，而不在历史方面，这正好与胡适所持的方法相反。冯著在历史方面比较薄弱，这是他自己和批评者都看到的事实，问题是如何看待这一事实。冯友兰暗示自己的著作是“哲学家的哲学史”，在某种意义上是为了化解对其著作历史方面不足的批评。其实，冯友兰与胡适的不同，主要还是做哲学史方法上的不同，在哲学史的性质或哲学史工作的范围方面，二人的理解就不一样。

冯友兰一直强调哲学与哲学史的不同，他认为哲学史主要是说明以前的人对于某一哲学问题是如何说的，而哲学创作则是要说明自己对于某一问题是怎么想的。他认为这个不同也就是照着讲与接着讲的不同。在他看来，这两者的追求是不一样的。从哲学史的要求来看，是要弄清楚历史上的哲学家的字句、观念在他们那里实际意指什么；从纯粹哲学家的观点看，则是把历史上的哲学家的观念、理论推到逻辑的结论，以便看出这些理论是正确还是谬误。^[12]简言之，历史家所做的是一种陈述性的工作，而哲学家所做的是一直创造性的工作。

冯友兰与胡适对中国哲学史工作的范围，理解基本一致，只是在评判方面，冯友兰认为应当否定。一部好的哲学史，要不要这种评判？金岳霖、陈寅恪在为冯著写审查报告时，认为哲学要成见，而哲学史不要成见，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根据一种哲学主张而写出来的。由此，金岳霖指出，胡著不是一部好的哲学史，而冯著是。方法论不同，导致了不同的中国哲学史的出笼。

胡适用实用主义来对中国哲学作出评判，固然有其失之偏颇的地方，但是，如果因此而认为哲学史不当评判，则未免有因噎废食之嫌。按照哲学解释学的观点，每个哲学史的作者都会不可避免地有其“成见”，没有成见地搞哲学史研究，那是无法达到的。哲学史是应当求历史的真相，但是，如果哲学史同时使学者知道各家学说的价值（事实上哲学史写作者往往有意无意之间发表自己的意见），也并不一定会影响揭示真相。客观陈述哲学史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即使勉强按照这种原则去做了，写出来的东西恐怕也只不过是哲学史史料学。冯友兰由于把哲学史的工作限制于“照着讲”，就感觉到了束缚。他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写作中，转换了写作角度，从“哲学”回到“史”的工作上来，采取述评兼合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哲学史，而废弃了那种不加评判的哲学史观念。在《新编》中，冯友兰明确提出：“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所谓反思就是人类精神反过来以自己为对象而思之。人类的精神生活的主要部分是认识，所以也可以说，哲

学是对于认识的认识。对于认识的认识,就是认识反过来以自己为对象而认识之,这就是认识的反思。”^[13]从这一论述的方式就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是有变化的,从以往死扣“哲学”字眼和来源而转化为以正规、严谨的论述方式来谈论哲学,史的选材和评价都是依据自己给出的哲学定义。与胡适作哲学史不同,他运用逻辑的分析方法,将历史与理性抽象的分析结合起来对中国哲学史进行分析,对哲学史中的各种哲学概念进行透彻的、清晰的分析,而并非胡适在评判各家学说价值时所作的效果贡献。就是说,在冯友兰的晚年,关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比以往又进步许多,不仅仅在方法论方面,而且在哲学观上都有了质的飞跃。然而,在晚年致力于《新编》的研究写作时,冯友兰关于哲学史方面的任务的阐述观点与胡适已无明显的不同(都主张述+评的方式)。当然这并非意味着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所用的范式已得到最终认可。然而,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里显示出的实证主义史学素养,却是后继无人的,在冯友兰及其后继者(如张岱年等)的更完备的现代哲学方法论的补充下,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更显其开放性、进步性。

三

我们看到,在不同的写作方法,不同的哲学观理念指导下,产生了不同的中国哲学史。然而,值得警惕的是,冯友兰从自己的哲学观出发,所建构的哲学境界是从抽象思辨和静态的体悟中实现对静态的天地境界的领悟的。也正由于这种觉解性质使得冯友兰对哲学的理解专注于精神活动上的觉解,而不可能以实践为基础来了解和把握实际对于人生的意义。他没有注意到价值的实现还须一个价值实际的过程,从而没有把人看作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更不可能通过实践作为实现人类最高理想境界的动力和途径。因此,从中国哲学发展史和面向未来的中国哲学的新发展来看,冯友兰的哲学研究只不过是一个过度阶段而已。因为,真正的哲学的本性不仅在于具有反思性、普遍性和超越性,而且还具有实践性、批判性、辩证性和开放性。其中,实践性是哲学的普遍现象,也是发展哲学的最本质的基础。正由于此,当代中国哲学的新开展并不是不要抽象思辨,而是说抽象思辨必须根植于现实社会发展的沃土之中,从而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和勃勃生机,并成为哲学这一人类古老的智慧之树的粗壮新枝。由此可见,冯友兰哲学观的限制给我们的启示还在于当代中国哲学应向平民文化与平民哲学张目,与人文精神的世俗化相一致。另一方面,冯友兰力图实现中国哲学的理性重建,在现代中国哲学中充分凸显出理性的作用与意义,克服中国传统哲学中(包括胡适的哲学观中)概念不清、论证不精、粗疏笼统、缺乏系统性的弱点,而这正是中国现代哲学重建的一项重要任务。冯友兰逻辑分析方法的引入使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有了更高的抽象性、逻辑严密性,为中国哲学建立现代化的概念范畴网络系统打下了基础,这是前无古人,也是足以垂范后学的。然而,尽管冯友兰提出的逻辑分析研究法充满了理性化的特征,但是它却没有能够在中国哲学的体系内容中为理论理性确立内在的自体地位。这恰恰是中国哲学现代化所不容轻忽的主要内容之一。冯友兰一方面把哲学界定为一种理智活动,并以一种近乎完全理智的心态来讲论哲学,这就限定了哲学的内容,从而减弱了注重人文价值的意义;另一方面,冯友兰的理论分析却又与传统儒学保持一致性,因而有如传统儒学,它并没有在哲学的内容中确立理论理性的自体地位,它对理性的注重仅仅只是落实于哲学

形式上。这一难题的症结在于，尽管冯友兰已意识到了西方文化的理性特质正是中国文化所缺，但他并没有通过对哲学本质的深刻反省，认识到认知理性对于哲学的内在性。因此，冯友兰不是要以西方哲学的理性形式作为锤炼中国哲学，并最终使之成为显发内在理性的利器，而是要把西方哲学所具有的理性方法，现成地搬到中国哲学之中来。他把逻辑分析法比做是西方哲学家点石成金的手指头，认为中国哲学所需要的就是手指头。然而，他并未能很好地解决中西哲学融会中国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矛盾，也没有能够解决好其中的言辞性与时代性的矛盾，同时，还导致了中国哲学现代重建中内容与形式的脱节，使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有所损黯，亦使中国哲学的机体灵活性陷入了一种僵固自封的模式。

所以，基于中国古代哲学体系的重建，必须首先摆脱传统哲学以注经或解经为主的方法，但又要保留那些能够体现中国传统哲学基本精神的语言（概念、范畴）和方法，并更大胆合理地吸收使用西方现代的新的语言表述方式和方法论架构；积极引入逻辑分析法，又要打破其僵化、冷峻性，从而激发中国哲学的机体理学。在中国哲学现代化的今天，坚持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又充分吸收西方哲学之优长，创立整体和谐的方法论体系，显发中国哲学的现代形式，推进中国哲学的世界化。

参考文献.

- [1] [4] 胡适. 中国哲学史大纲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1-2.
- [2] 宋剑华. 论近代思想学术史上的胡适 [M]. 学术界, 1991. (4).
- [3] 姜义华. 胡适学术文集 [C]. 北京: 中华书局, 1991. 20.
- [5] [6] [7] [11] 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 (上卷)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 [8] [9] [12] 冯友兰. 中国哲学简史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 [10] 冯友兰. 三松堂学术文集 [C].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4.
- [13] 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新编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2.

Pondering over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Philosophy History in the View of Different Philosophical Viewpoints

Yu Xiuling

[Abstract]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the research of philosophy history to set up different philosophical views. Today, the whole Chinese philosophy and culture is facing the challenge of the social turn of China and the choice, re-build, even re-setup of the new century. Thus, Chinese philosophical history can base on the philosophical views of Shi Hu, You-lan Feng, and then forms the different philosophical history on account of their different philosophical views, which will put the inestimable use in our researching on Chinese philosophy, which will face the modernization and the new development of new century.

[Key words] philosophical views philosophy history You-lan Feng Shi Hu new development

(本文作者系哲学系 2000 级博士生; 责任编辑: 刘涛)